

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刘凤鸣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0.12

ISBN 978-7-101-07642-4

I.山… II.刘… III.①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古代②山东半岛—地方史—研究—古代 IV.①D829.312.6②F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184 号

-
- | | |
|------|---|
| 书 名 | 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 |
| 著 者 | 刘凤鸣 |
| 责任编辑 | 王传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frac{1}{4}$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7642-4 |
| 定 价 | 38.00 元 |
-

序 一

王志民

中韩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是中国通过海上与之交往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在中韩交往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与山东半岛有关联,历代山东人为中韩文化交流和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中韩关系研究热,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山东半岛这一特定视角研究古代中韩关系的专著,目前尚不多见,是一个应深入探讨和开掘的重要领域。刘凤鸣教授依托于长期以来对胶东半岛文化深入研究的厚实基础,即将出版他的新著《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在这方面既有补弱填缺的学术价值,也为今后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0世纪以来,尤其近30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众多东夷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证明山东半岛在史前时期与朝鲜半岛就已经有了多种形式的联系与人员往来,而至迟春秋时期,齐国已与朝鲜半岛有了大量的贸易往来,这是有文献记载的不争事实。本书分析了先秦时期山东半岛人群向朝鲜半岛的迁徙、山

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通道、秦人徐福东渡、汉武帝时代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唐代山东半岛在中韩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宋、元、明、清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等内容,将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认真进行了梳理研究,不仅从学术上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和齐鲁文化研究献出新成果,也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为促进和发展文化交流、增进传统友谊作出了新贡献!

即使粗览该书的大致内容也能看到作者在中韩关系的诸多方面,都颇用心力,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例如:关于徐福东渡问题,作者提出了徐福船队从山东半岛北部,今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群岛,渡过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线“循海岸水行”南下,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并最先定居在了朝鲜半岛东南部,朝鲜半岛三韩时期辰韩的许多部落是徐福东渡时在朝鲜半岛东南部所建立的等等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较多论证和考证。这无疑在徐福研究上增添了新说。又如:作者对汉武帝时代出兵朝鲜,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楼船军人数、船只、起航地及州胡国的考证,都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重新审视、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考之有据,言之成理。

值得提出的是:作者走出了一般历史文化研究者以史证史的老路子,立足当代,往观历史,以一正确的文化史观来看待历史,探讨未来。在书中作者特别注重挖掘历史上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友好往来的历史足迹和文化渊源。例如:从唐代新罗人在山东半岛的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来解析两国人民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又如:作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明代在支援反击日军侵朝的“壬辰战争”中,山东半岛的登州、

莱州实际是支援朝鲜的战略大后方,提供了粮食、布匹;明军前线总指挥、青州人邢玠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山东人为“壬辰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等等。作者在这些方面均挖掘出新史料,提出了新的有见地的看法。

齐鲁文化研究,经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不断努力,已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成果,从学术层面看,目前的研究还在向纵深发展。其中,从“纵横发展”的面讲,拓展新的领域,尤其是齐鲁文化与海外关系的拓展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从“深入”研究的角度讲,抓住一个方面,甚或一种重要文献、一个重大事件的深化研究也是必须和重要的。在这两个方面,刘凤鸣教授都做了一些值得重视和肯定的努力。近几年,他专注于山东半岛与海外关系的深入探讨,继《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出版后,又推出了新作《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很值得我们学习。对他的治学勤勉精神,我感到由衷敬佩。特致祝贺,兼以充序。

2010 年 4 月于济南

王志民: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

序 二

邱伟钜

《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刘凤鸣先生嘱我作序,我毫不踌躇就答应下来。倒不是出于对自己文章的自负,而是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都无法拒绝凤鸣先生的约请。

说起来很有趣,我与凤鸣先生的交往是未见其人先读其书。

出于学业背景和职业习惯,在旅居海外十几年回到国内后,我仍然十分关注中外文化与学术的交流。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共和国外交新闻战线的峥嵘岁月,毛主席当时要我们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因此,那一代的新闻工作者都无一例外地“关心天下大事”,我当然也乐此不疲。

朋友和同事们都知道我有此好,所以不断地给我推荐这方面的书籍、报刊及其他媒介。

2009年春夏之交,朋友将一册《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交给我,说这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师所撰,是一本具有“开辟”意义的专著,虽然着眼于特定的地域,但视野高远、引据浩繁、推翻成说、自成体系,而且把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源“钉”在

山东半岛。此说一出，东海、南海诸地自然由源化流，多年的“始航地”之争一时熄火，以至后来有的学者开始呼吁停止“始航地”之说。

此书影响还不止于此，联合国关于丝绸之路项目的官员从此便抓住登州不放，与烟台市政府、蓬莱市政府达成了共识，欲将好几项丝绸之路项目落户于此，投资额达20亿之巨。此事虽说目前仍在商谈阶段，但各方面都对此抱有乐观的预期。

一本专著竟有如此影响？我开始认真地读《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并开始关注该书作者刘凤鸣先生。同年秋天，我因公去山东烟台，终于在鲁东大学见到了他。

书为媒在先，人相见在后。虽是初见，但已毫无陌生之感。半日的倾谈已难以分清宾主，好像是久别重逢的“发小”。凤鸣先生自报家门：做学问并非“科班”出身。因为他的职业生涯竟是“校官”，从毕业留校就做学生工作，后来，管过学校的后勤、行政、党务，一直到从学校领导干部的位置上退下来，做学问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事。

说实话，当时我挺震撼的。我也是“双肩挑”，并且比凤鸣先生年长十几岁，我深知在当今社会做官不易，踏踏实实做出自己的学问更难，而他竟然做到了，而且做得如此出色。

继《胶东文化概要》之后，《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成功地实现了由面到点、由浅入深的学术转型，廓清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版图。而今《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又呈丰硕，不啻是一次学术水准的全面提升。

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一水之隔，自古以来就是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山东人民为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无奈和

牺牲。书中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读后不仅令人感到别出新意,而且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代中韩文化交织的紧密,倍加珍惜源远流长的中韩友好关系。书中许多观点会给学术界带来新的启迪,推动中韩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信《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一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进中韩经济文化交流。

我对《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书稿的阅读很仓促,其学术价值自由方家评说。但有两点体会,于我感怀至深。

一是,“冷板凳背后的炽热”;二是,“推翻历史的胆识”。

做学问当然要坐冷板凳,有了“十年冷”,才杜绝“一字空”。当下学术界弥漫的空疏之风让很多学术的板凳冷不下来,造假掺水的现象已有了“普世”的趋势,这让我感到一次次的悲哀和灰凉。在这样的大势下读到《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无疑是一次振奋。

凤鸣先生的冷板凳坐得稳,行文布局中读出了他准备的功课绝不仅仅是几十万字,而且在原典上下足了功夫。我注意到他的立论很少“臆推”,更多的是旁征博引,多重举证。例如一条“嵎夷”,他便引证了《说文解字》、《后汉书》、《尚书注疏》、《通典》、《书传》、《尚书注疏·考证》和《尚书校释译论》七种经典。除引经据典外,他还运用了大量史料,并吸收历史和考古的最新成果以圆其说。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背后,投射出凤鸣先生对学术的执著和热爱。我们常说赤子之心,是脱离了功利浮躁后的投入之心,我想即指此也。

在学术冷板凳之后燃烧的炽热之心,是否也是凤鸣先生为人处世的写照?

就单纯的学术版图而言,凤鸣先生入门很晚,但他一步步

坚实地走来,拒绝许多花哨泡沫的引诱,坚持以我手写我见,并且出手不凡,高屋建瓴,屡屡占领该领域的制高点。这恐怕不光来源于做学问的功夫,还与做人的笃实不无关联。

对于学问,他旗帜鲜明,不苟且、不屈从,纵然在大师面前也无改自己的识见。这同样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的勇气,更是自潜史海、自践自行之后的学术自信,支持他这种自信的,无疑是他吃重的付出。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辞。”也许是伟人的抱负,也许是诗人的胸怀,也许更是学者的节操,我想。

从《胶东文化概要》到《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再到《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是凤鸣先生在学术攀登上铺就的三层台阶,以此为奠基,凤鸣先生肯定还会拾级而上。我期待着他更新的成果问世。

2010年初夏于北京

邱伟钜:(中国)华夏文化促进会会长。

序 三

万 明

鲁东大学刘凤鸣教授继获得好评的《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之后,又推出了一部研究古代中韩关系的力作——《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本书既贯穿了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古代交往历史,又各章独立成篇。作为专题研究,或就某一历史时期,或就某一历史事件,或就某一历史人物,论述紧紧围绕山东半岛在古代中韩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一主题展开,客观解读了历史悠久的中韩关系,对重新认识古代中韩关系史,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中韩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虽说近几年出了不少中韩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还没有见到从山东半岛这一特定区域来研究中韩关系的专著。刘凤鸣教授依托于长期以来对山东地方史研究的深厚基础,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尧、舜、禹时期的嵎夷是非常活跃的东夷部落,嵎夷出现在朝鲜半岛,是从山东半岛迁徙的结果,还是嵎夷本身就是朝鲜半岛的土著部落,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与之相关联的是古青州的疆域仅在山东半岛还是包括辽东半岛,也是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解读。

但占上风的,包括许多史学经典,都认为嵎夷原本就生活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南北朝时期范晔所作《后汉书》、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注疏》和杜佑所撰《通典》,以及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的《书传》等都持有这种观点。当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尚书校释译论》中也延续了这样一种观点:嵎夷“地在渤海东岸”,“青州分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两部分”。作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在书中用丰富的史料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即嵎夷最初曾生活在山东半岛东部沿海一带,春秋时期齐国祭祀的日主之地,应是《尚书》里记载的嵎夷部落的故土。嵎夷,包括东方九夷变为海外之族应在西周中、后期,因战乱从山东半岛辗转迁徙到了朝鲜半岛。尽管作者的观点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考古研究予以支持,但能够挑战传统观点,并能自圆其说,有理有据,确实难能可贵。

近几年,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越来越热,“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和地点,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源头”的争论也随之出现,由于对中韩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起步较晚,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我国东南沿海江、浙、闽、粤等许多港口城市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本书作者最先提出,中国最早开展海外贸易的应是春秋时期的齐国,“是齐国的对外开放国策,‘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主动与海外朝鲜诸国做生意的大动作,拉响了山东半岛沿海港口起航船的汽笛;是齐国‘齐冠带衣履天下’,‘财蓄货殖,世为强国’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为海上丝绸之路贮备了充足的贸易货源;是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便捷的海上通道,铺就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作者在本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论述。

关于秦人徐福的研究,这几年在史学界炙手可热,特别是徐福“入海求仙人”的船队是从哪里起航的?沿着一条什么航线?目的地在哪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作者在书中综合了自己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经过考证还认为朝鲜半岛东南部辰韩与徐福东渡也有联系,徐福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朝鲜半岛。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徐福的船队与辰韩的关系,过去还没有人提出过,作者如此深入的研究,其成果不仅令人鼓舞,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引领关于辰韩源头的进一步探讨,深化中韩古代人员往来和文化交融的学术研究。

作者对汉武帝时代从山东半岛出兵朝鲜的楼船军人数及古代州胡国的考证也很有新意。作者提出了汉武帝时代出兵朝鲜的楼船军是五万人,而不是传统理解的“七千人”,对《史记·朝鲜列传》提到的“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认为是“兵五万人”分批渡海,首批是“齐兵七千人”而已。对州胡国所在的位置,作者也对已有的韩国“济州岛说”、中国“庙岛群岛的长山岛说”提出了质疑。我们从作者层层细致分析中不难看出,没有对山东半岛历史文化的熟知和独到的研究,就很难有如此深入的研究成果和独到的见解。

对唐代山东半岛在中韩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不仅从政治、文化、经贸各个层面第一次作了系统的专题论述,文中也加入了作者许多新的见解。如对唐军从山东半岛出兵朝鲜,支援新罗统一战争,所带来的划时代重大意义的认识;从新罗人在山东半岛的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来解析中韩两国人民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对驻青州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和新罗人张保皋、金清等为中韩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所作的历史贡

献,及张保皋在山东半岛筹建赤山法华院动因的分析等等。作者大力发掘,利用中、日、韩三国的史料,对张保皋被害时间加以考证,对当今有些文学影视作品、报刊评论无限拔高张保皋进行批判,还原了历史上张保皋的真实面目,阐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客观评价的史学观。读后都能从中获得新的裨益。

作者对宋、元、明、清时期山东半岛在中韩关系中重要地位的论述,着重点均放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之下。如作者指出:宋代强调的是山东半岛在宋与高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抵御契丹(辽国)中的军事地位;元代强调的是山东半岛在元朝廷“总制东方事”,即处理与东亚诸国关系中的突出地位;明代强调山东半岛是维护中朝传统友好关系的重要窗口,是共同抗倭和反击日本侵略的重要后方基地;清代则强调了朝廷的海禁和列强的炮火,均没有阻挡住两国人民在古老海道上的人员和贸易往来。特别是作者对山东半岛在“壬辰战争”中重要地位的专题论述,着笔于中华儿女帮助朝鲜人民抗击侵略,用生命和热血捍卫中朝传统友谊作出的重要贡献和重大牺牲,饱蘸深情,令人感慨。可能是因为篇幅的原因,作者没有像阐述古青州嵎夷、徐福东渡、汉代楼船军那样对宋、元、明、清时期山东半岛在中韩关系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做更深入的挖掘,但现有的专题论述已足以说明山东半岛在古代中韩关系中的突出地位,以及山东人民为中韩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了。

在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研究方面的专著出版,本书是第一部从山东半岛这一特定的地域入手,深入探讨古代中韩关系的力作。书中的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古代中韩关系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也带来许多新的启示。

古代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往来主要是通过海路,从山东半岛沿海起航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曾为沟通中、韩、日贸易往来,增进中、韩、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几年,对中、韩、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刘凤鸣教授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他的代表作《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就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三年之后,刘凤鸣教授又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此书仍以山东半岛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由于春秋时期的山东半岛最早开辟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后来的中韩海上贸易,特别是中唐之前的中韩海上往来主要是“循海岸水行”,即使是江浙一带,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也途经山东半岛,甚至到了宋、元、明时期,山东半岛仍然是中韩海上贸易的主要基地和周转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应是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她的出版必将开启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万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前 言

(一)

朝鲜半岛也称韩半岛,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是上世纪 40 年代才发生的事情。现时的两个国家,北半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部的大韩民国,其政治现状于 1953 年才被确定下来。所以,现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古代中朝关系、古代中韩关系方面的书籍,也大都讲述的是中国和古代朝鲜半岛的关系。

古代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往来,大都通过海路,而且与朝鲜半岛南部交往为多。本书定名为《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既论述山东半岛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侧重于对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南部,即今韩国一带关系的研究。由于书中内容是按历史时期或人物分章撰写的,不同的时期或人物其所处朝代的疆土都不一样,如韩国的三韩时期、三国时期、新罗时期、高丽时期、李氏朝鲜等,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版图,虽然本书侧重于古代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南部关系的研究,但这个朝鲜半岛南部,并不等同于现在韩国的疆界。所以,本书既是山东半岛与韩国的古代关系史,也是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古代关系史。

(二)

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往来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特别是与朝鲜半岛南部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几乎都与山东半岛有关联。山东人民为古代中韩文化交流和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尧、舜、禹时期的山东半岛的嵎夷在朝鲜半岛的出现,说明了山东半岛在史前时期就已经通过海路与朝鲜半岛有了紧密的文化联系,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早在春秋时期,山东半岛就与朝鲜半岛开通了海上贸易。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相国管仲的建议下,开办与朝鲜半岛的海外贸易。齐国的丝绸输出到了朝鲜,朝鲜的“文皮(有花纹的兽皮)”也大量进入到了山东半岛。春秋时期的齐国开辟了与朝鲜等东亚诸国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秦代徐福东渡,为古代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韩国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徐福的传说,温家宝总理亲笔书写的“徐福公园”的泰山石竖立在韩国济州道西归浦市徐福公园。徐福是活跃在山东半岛的方士,也是从山东沿海出发去的朝鲜半岛,后来又辗转去了日本,日本也有许多徐福的传说。

韩国三韩时期,辰韩人多是从小山东半岛乘船去的齐人后裔,他们为躲避战乱渡海来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当地的韩人接纳了他们,而且“割东界地与之”。齐人后裔与当地土著韩人和睦相处,并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艺和生活方式带到了朝鲜,推动了当地文化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是有史料记载的中韩之间最大的一次人员迁徙和文化交流,至少有 10 万齐人后裔定居在了朝鲜半岛南部,即今天韩国。

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万人”进入朝鲜。这次从山东半岛出兵朝鲜,不仅显示了汉代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便捷、通畅的海上航道和山东半岛支撑庞大海运所具备的后勤保障能力,也推动了山东半岛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及中韩之间的海上贸易。《后汉书》记载的韩国西部海岛的百姓“乘船往来,货市韩中”,反映了当时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实况。

隋唐时期,为武力调停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关系,山东半岛成了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主要后方军事基地。唐高宗时,唐军从山东半岛东部成山渡海,帮助新罗基本统一了朝鲜半岛。为了支援新罗的统一战争,大量的粮草从山东半岛运往朝鲜半岛,许多山东子弟兵血洒朝鲜半岛,山东人民为了朝鲜半岛的统一作出了重大牺牲。唐代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中国出海至东亚诸国的主要官方通道。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密州还是与朝鲜等东亚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和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唐代宗至五代时期,驻山东半岛青州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代表朝廷处理与朝鲜等东亚诸国关系及接待迎送的外事机构,也为中朝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海上王”的新罗人张保皋把山东半岛作为唐、新(罗)、日三国贸易的主要基地,繁荣了唐代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北宋时期,山东半岛仍然是中朝往来的重要官方通道,高丽使者“其舟船皆自登州海岸往返”。北宋与高丽之间的紧急函件往来“皆自密州牒报”,也说明了山东半岛的密州在古代中韩关系中的独特地位。为了拓展与朝鲜等东亚国家的海外贸易,朝廷还“置密州板桥市舶司”,有力地推动了山东半岛与海